

# 两位蓬莱老部长与《戚继光研究丛书》

□蔡玉臻

蓬莱城北，丹崖山楔入黄海，八仙过海的传说随浪流传。而从登州卫走出的一代名将戚继光，才是这座古城更为崇高的精神丰碑。

1987年，适逢戚继光逝世400周年，蓬莱举办学术研讨会，编纂出版了论文集。但真正将戚继光本人著作、年谱、传记以及时代背景资料系统校勘汇刊成帙的，是世纪之交由两位蓬莱籍离休老部长牵头推动的中华书局版《戚继光研究丛书》。丛书牵头人之一高扬文，系原煤炭工业部部长，2004年1月逝世；另一位陶琦，系原交通部副部长，2003年5月逝世。丛书中的多数分册都是二人晚年审读校样，在他们身后陆续付梓面世，堪称两位老领导留给家乡的一份文化遗产。

## 两位蓬莱乡贤的同窗革命经历

高扬文，原名高方虹（亦作高芳鸿），1917年生于蓬莱后关村；陶琦，曾用名陶中祐，1917年10月生于蓬莱陶家村（孙陶）。1936年，二人同在蓬莱县立中学读书，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于眉、孙晓风等人一道，组织声援华北救亡运动、为绥远抗战募捐、开展抗日宣讲。陶琦于1937年9月由于眉介绍入党，高扬文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高扬文奔赴太行山根据地，曾在《解放日报》任职，后历任冶金部、煤炭工业部领导职务；陶琦投身山东纵队，进入抗大学习，后来任职交通部水运局，官至副部长。二人同乡、同庚、同窗，又同在革命战线奋斗，离休之后，回望桑梓故土，将目光投向了400多年前从家乡走出的名将戚继光。

## 地方文史动议，老干部牵头

这套丛书并非简单的文化项目，完整工作链条如下——发起端：蓬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希望把本土相关文献，从早期油印论文集升级为学界可以直接征引的权威定本；

牵头端：高扬文、陶琦以蓬莱籍老部长身份出任丛书主编，联合撰写总序，依托自身资源推动书稿进入中华书局出版流程；

执行端：军事科学院范中义，以及李克、郝教苏、仝晰纲等明史、军事史专家，分工开展校点、撰述工作；

落地端：中华书局2001年至2004年陆续推出，分繁体竖排、横排精装两种版本，定名《戚继光研究丛书》。

## 原规划10种，实际刊印8种

依据高扬文、陶琦所撰丛书《总序》记载，编委会最初规划整套丛书共计10种，分为三大部分：戚继光个人文集五种、史料整理两种、当代研究著作三种。最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8种，尚有《戚继光研究资料汇编》《嘉隆万社会与戚继光》两种虽列入立项规划，但未能刊印面世。

这套丛书把戚继光的文章奏疏、兵学著作、生平年谱、时代背景、人物评传融为一体，从“言、法、行、世、评”五个维度，构建起完整的研究体系，也是明史研究领域第一套可供校勘、征引、收藏的戚继光权威丛书。

市面旧书网常见“全8册合售”与“全10册合售”两种说法。所谓“10册”，是旧书经营者将中华书局出版的8册，搭配华文出版社2001年蓬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编印的《戚继光研究论集》合并成套出售。该论集并不属于中华书局丛书原定10种规划之内。

陶琦2003年5月辞世，高扬文2004年1月辞世，丛书的最后一本《明代倭寇史略》于2004年2月出版，两位主编离世恰恰在丛书收尾阶段。但两部书稿未能付梓，是书稿成熟度、出版项目等综合因素造成，不宜简单归因于二人离世。

## 乡贤情怀与故土记忆

高扬文、陶琦合写的《总序》立意清晰：戚继光是登州故土走出的先贤，蓬莱后人有责任整理保存他的著作；整理古籍不是单纯抒发怀古幽情，戚继光抗倭御边、练兵保民的精神，在当代仍具备现实价值。

这一立意，也与二人的人生经历高度契合：一位主管能源实业，关乎国计民生；一位主管海运海事，熟谙漕运和海防。回望明代登州卫走出的少年将军，他们的评述既没有书斋文人的空泛，也没有文宣宣传的浮夸。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主编团队整理《戚少保年谱耆编》，以清道光二十七年仙游崇勋祠刻本为底本，完整点校戚祚国等人编纂的十二卷的第一卷，为后世所有戚继光年表、人物传记确立了可靠的时间参照。这是靠文学演绎无法完成的硬核文献工作。

## 三项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果仅仅把这套书看作两位蓬莱老部长推动的家乡项目，会低估它的学术地位。在明史与戚继光研究谱系当中，丛书具备三项不可替代的价值：

《止止堂集》此前缺少易得的现代点校单行本，中华书局本让这位“诗人将军”的诗文本得以稳定流通；

《戚少保年谱耆编》点校本，成为后世各类戚继光传记、年谱最核心的时间基准史料；

《明代倭寇史略》将戚继光置于嘉靖倭乱的宏大时代背景之下，避免人物传记沦为孤立的英雄叙事。

时至今日，学界研究戚继光，著作注释当中经常可见“高扬文、陶琦主编《戚继光研究丛书》本”的引据。这套丛书早已跳出地方乡土读物的范畴，成为明史领域可资依赖的公共学术基础文献。2008年蓬莱改组戚继光研究会，筹办第四届戚继光学术研讨会时，依旧将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列为当地文史工作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

投稿邮箱  
ytrbzk@126.com

# 叫偏与使诈

□王秉涛

老拳师问场子在哪，新拳师举起右手向右前方指去。说时迟那时快，老拳师挥拳打向新拳师，戴在左手上的钢指环打破了新拳师的左脸颊，顿时鲜血淋漓。老拳师得手后，和他的徒弟兔子似的飞奔而去。

第二天早上，新拳师的房间一直没有动静，徒弟们进门一看，房间空无一人，想必师傅已经离去多时。

这事儿发生后，远近议论纷纷。有人说老拳师使诈不讲武德，有人说新拳师技不如人，咎由自取，一时成为人们聊天的热门话题。

气，拉响了仅剩的那一颗手榴弹。

轰——

一声闷响，火光包裹了他和围上来的日本兵。河水被炸起丈把高的水柱，落下来时，已分不清是水还是血。17岁的生命，在那个清晨戛然而止。区政府保住了，兵工厂保住了，乡亲们保住了。只有他，永远地留在了17岁。他用自己的稚嫩的生命，守护了一村人的安全。

80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清澈见底的月牙河边，河水浅浅的。我蹲下身，把手伸进水里，凉意顺着指缝渗上来，像时间在掌心穿过。我忍不住想，假如我是赵书策，站在那个清晨的路口，我会怎么选？我会不会犹豫？会不会怕？会不会和大家一起跑？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可17岁的赵书策，替我们所有人，做了那个最难的决定。

面对黑压压的敌人，面对必死的结局，有多少人能够坦然走向死亡，只为给他人争取一线生机？赵书策做到了，他不是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或许，在他心里，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在赵书策牺牲整整两年后，万人追悼大会在村东的高岗上召开。政府授予他“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立起了纪念碑。会上宣布：赵家沟村，从此改名为赵书策村。从此，一个少年的名字，成了一座村庄的名字。这在招远金岭镇是唯一的。

他的名字，成为这片土地的名字，让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每一次念出村名，都是一次默悼和纪念。

席卷村村户户，刘鹤浩与丈夫一同投入到家乡的革命工作当中。

1945年，丈夫接到组织调令，远赴外地从事革命工作。从此，家中的所有担子全部落到刘鹤浩肩上。白天下地耕种，回家之后还要悉心照料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等到夜深人静，安顿好家事，她便投身妇救会的各项事务，组织村里妇女赶制军鞋，下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每一项工作她都不辞辛劳，在后方默默支援前线。

1947年，刘鹤浩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本村妇救会会长。肩上的责任愈发沉重，她投身革命的热情也愈发高涨。平日里她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讲革命政策，发动全村妇女赶制军需物资，募集慰问品犒劳前线战士，耐心劝导乡亲们送家中青年参军参战。在她的带领之下，从家村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同年，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全面铺开。刘鹤浩不畏强权，始终冲在斗争第一线，带领贫苦百姓同地方恶霸进行斗争。在批斗恶霸庞太康、丛立昌的群众大会之上，她第一个登台发言，义正词严地历数恶霸欺压乡邻的桩桩罪状，极大鼓舞了在场群众的斗志，有力推动全村土改工作顺利开展。

她的举动，彻底触怒了遭到清算的地方恶势力。当年8月，庞太康、丛立昌二人纠集还乡团，随同国民党军队窜回丛家村，对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展开疯狂的报复，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村庄。一天夜里，为妥善转移村内重要物资，刘鹤浩冒险返回村中，不幸在村东沟被还乡团一伙抓获。

敌人一心想要从她口中逼问出当地革命干部的藏身地点与村里各项机密，对她动用残酷的刑罚。皮鞭如雨点般落下，打得她皮开肉绽。刘鹤浩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句敌人想要的情报。穷凶极恶的还乡团恼羞成怒，又残忍地将她绑在马尾之上，策马狂奔，一路拖拽和摧残，最后用刺刀将她杀害，并将遗体抛入井中。年仅27岁的巾帼英雄，就这样将自己滚烫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她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之上，壮烈牺牲。

旧时烟台民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甲乙双方出现无法调和的纠纷时，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挑战，以比武定论。这个过程烟台话称之为“叫偏”，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单打还是群殴、赤手空拳或是械斗、赢输果定（伤或死）等约定。

烟台话中的“叫偏”，可以上溯到2500多年的春秋时期，那时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宣战就叫

# 以你之名，冠汝故乡

□紫苏



赵书策。



人们在赵书策牺牲的地方建立了民族英雄纪念碑。于海波/摄



赵书策村的村碑。于海波/摄

从招远市区一直往西走，过了金岭镇，到了大户陈家村再向西，是一条缓缓向上的乡道。上了那道大坡，高岗之上，路边立着一块村碑，碑上赫然刻着四个字：赵书策村。

赵书策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一个人要做出怎样的事情，才能让生他养他的故乡，甘愿为他改名且以他为名？要知道，在招远，村庄的名字大多来自姓氏宗族或地形地貌，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村庄，是罕见的。我想，那一定意味着这个人在这片土地的意义，已经重大到无法用其他方式来纪念。

经过探寻，我终于明白，招远人正是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民族英雄赵书策的深切怀念。

这个村庄，原名赵家沟。1926年冬天，赵书策在这里出生，小小的山里娃长就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副倔强的骨头。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胶东。赵家沟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因为地势隐秘、民心赤诚，成了抗日游击小组的常驻地。上级在这里设立了兵工厂、银行、矿物局和粮站等后方物资供应点，还在这里隐藏武器弹药。兵工厂藏在山坳里，打制的枪械深夜运往前线；北海银行的账本锁在深挖的地窖里，每一分钱都用于支前。赵书策在大人堆里钻来钻去，耳濡目染，一颗心早就跟着队伍走了。1941年，15岁的赵书策是儿童团长，负责站岗、放哨，为组织传递情报。一根红缨枪比他高出一头，可他立在村口的样子，像一棵钉进

# 两位胶东革命女性的家国壮歌

□曹景广

烽火漫卷招北大地，灵山巍巍，见证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往事。回望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胶东招北（1941年至1950年，招远县分为两个县，招远县城以北的区域为招北县）这片红色热土之上，不仅有驰骋疆场的男儿将士，更有一大批深明大义、铁骨铮铮的巾帼英雄。她们生在乡野，长于农家，原本盼望一份阖家安稳、烟火寻常的生活，却在民族危亡、时局动荡之时挺身而出，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国重任。

本文记述的两位女性，一位是金岭镇掉钟头村的革命母亲吴传英，先后忍痛送丈夫与三个儿子奔赴前线，用半生的血泪书写舍家为国的大义；一位是宋家镇丛家村女烈士刘鹤浩，身为村妇救会会长，她奔走支前、投身土改，不幸落入还乡团之手，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将27岁的生命永远留给了故土。这两位平凡的胶东女性，虽然选择了不一样的斗争道路，却怀揣着同样滚烫的家国初心。岁月流转，山河换新，她们的故事不应被时光尘封，她们的风骨永远值得后人缅怀。

在招远金岭镇掉钟头村，钟离河水静静流淌，岁岁北流。流水冲刷着世间的变迁，却永远冲刷不掉村里代代相传的一段红色往事。这里便是革命母亲吴传英的家乡，这名普通的农村共产党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胸襟与毅力，先后送丈夫和三个儿子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四人相继奔赴疆场，留下“一门四英雄”的千古佳话，在招北革命史上写下了厚重而悲壮的一页。

吴传英生于1901年1月，一生历经清末动荡、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的漫漫苦难。艰苦的乡间岁月，磨砺出她刚毅、豁达、善良的品格。当胶东大地燃起革命火种、进步思想传遍乡野时，她主动接受革命教育，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处乱世，她深深懂得国破家亡的道理——民族大义重于儿女情长，只有在侵略者赶出家园，寻常百姓方能拥有安稳的日子。

1938年，日寇铁蹄踏入招远，胶东各地烽烟四起。国难当头，吴传英毅然做出第一个艰难抉择，送丈夫张丕丰报名参加八路军。丈夫辞别故土亲人，奔赴抗日前线，12年转战南北，在部队担任排长，常年冲锋于枪林弹雨之间。连年的征战让他多处负伤，落下终身残疾，被评定为二等残疾军人，身负伤病方才退伍还乡。丈夫离家之后，家中的全部农活、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尽数压在吴传英一人肩上。白日子里她地下耕耘，操持生计，夜晚还要秘密参与村里的革命工作。漫长的别离，她只能把对丈夫的思念默默藏于心间，咬牙扛起家的一切，不让前线的丈夫有一丝后顾之忧。

土里的小树。情报装进空心柴棒，或塞在鞋底夹层，他跑十几里山路送到邻村联络点，汗透衣衫，从未湿透。

1942年，16岁的赵书策加入了青救会，任青救会主任。赵书策和其他村干部密切配合，教育群众严守机密，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使我党的战勤物资和人员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又因为日常工作机智聪敏、表现突出，他还获得了兵工厂破例奖励的两颗特制手榴弹。

1943年阴历九月，因汉奸告密，驻招远城的日伪军出动大队人马，妄图将驻扎在赵家沟村的区政府和兵工厂一网打尽。二十五日，天刚蒙蒙亮。赵书策握着红缨枪，站在村外的高坡上放哨。他忽然望见远处尘土扬起，不好，日本兵来了！

他拔腿冲进村，来不及挨户敲门，就一路嘶喊：“鬼子来了！快撤！快往山里撤！”喊声撕裂了清晨的宁静。区政府的人惊醒，兵工厂的工人抱起模具就往后山跑，乡亲们拖儿带女奔向山里。赵书策却没有跟着人群跑。

他转身，向相反的方向奔去。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吸引日本兵的视线。他跑过田埂，跑过石桥，跑到月牙河边。看着日本兵越来越近，他甩出了一颗手榴弹，烟尘腾起，有几个日本兵倒地。恼羞成怒的日本兵举起了罪恶的枪，子弹击穿了他的后背。他扑倒在地，血渗进河滩的沙砾里。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日本兵以为他必死无疑。当他们围上来查看时，他拼尽最后一丝力

战火连年不息，保家卫国的信念，早已深深扎根于这个农家小院。1941年，长子张君师长大成人，吴传英强忍心中不舍，亲手送长子参加八路军。张君师辞别母亲，投身招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穿梭在灵山的山野沟壑之中奋勇杀敌。可噩耗很快便传回村中，1942年4月，在招城战斗当中，张君师浴血奋战，不幸壮烈牺牲。

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犹如利刃刺心。巨大的悲痛没有压垮这位坚强的母亲，擦干眼泪之后，吴传英依旧初心不改。她清楚，抗争之路尚未走到终点，唯有坚持到底，才能换来后世百姓的太平。

抗战胜利的曙光缓缓到来，国内的解放事业仍任重道远。1945年，吴传英再一次割舍骨肉亲情，送次子张君忠走上革命的道路。谁料命运无情，1947年，张君忠在部队执行任务期间，意外触电牺牲。接连痛失两子，乡亲们无不为此位母亲落泪惋惜。可吴传英依旧没有被苦难击倒，始终将家国大义放在心头。

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前方战事紧张。1947年2月，她又义无反顾地将三子张君成送去参加解放军。年轻的张君成踏着两位兄长的足迹奔赴疆场，一路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朝鲜烽烟起战火，张君成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远赴异国保家卫国。1951年5月，惨烈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张君成血染疆场，为国捐躯。

三次丧子之痛，无数个以泪洗面的漫漫长夜，吴传英却从来没有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照顾的请求，只将万般悲痛独自埋藏心底。

为表彰这个家庭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当时的招北县授予其“革命家属”光荣称号，赠予匾额一方，匾额之上题写着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一门四英雄。一方牌匾，承载着一个家庭满门报国的赤诚，镌刻着烽火年代胶东儿女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它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段由血泪与牺牲铸就的历史见证。

如果说吴传英是于苦难之中默默坚守、倾尽全家之力支援革命的英雄母亲，那么刘鹤浩便是站在斗争最前沿，宁死不屈、以身殉志的巾帼斗士。

宋家镇丛家村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英烈刘鹤浩。刘鹤浩生于1920年，18岁嫁入丛家村，丈夫名为丛仁臣。原本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乡间女子，守着家庭，养育一双年幼的儿女，期盼一家人能够平安度日。时代洪流滚滚而来，1940年，招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抗日救国的风潮